

〔美〕庞百腾撰
陈俱译

沈葆桢

评传

Shen Pao-che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中国近代化的尝试

上海古籍出版社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First published 1994
Shen Pao-che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avid Pong

沈葆楨評傳
——中國近代化的嘗試
[美]龐百騰 撰
陳 俱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經銷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交通大學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4.875 插頁 5 字數 319,000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000

ISBN 7 - 5325 - 2699 - 2

K · 299 定價:25.10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爱妻马帼雄

——著者

F437/2

本书中文版出版,承蒙德拉威大学文理学院资金资助,及剑桥大学出版社赞同,特此一并致谢。

刘 序

清代政府于平定太平天国及捻军之后，一二十年间有新的景象，史称“同治中兴”。“中兴”是传统的历史名词，如汉代的“光武中兴”，或唐代的“至德中兴”，都有朝代复兴之意。但是在西方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因受已故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的影响，“中兴”一词常译为 restoration——这个英文字有复兴之义，又有恢复之意。依照芮玛丽的看法，同治中兴不但是清代的中兴，而且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在思想上和政策上，儒学被重新肯定。儒学教人自修，在伦理上尊崇礼教，在政治上注重人才、注重养民。同治中兴的成功不只是军事上的成功，而且是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功；至少在内政方面是这样。^[1]

至于对外关系及对外政策，芮玛丽指出同治中兴时代并非毫无建树。总理衙门的创立，地方大吏之利用中外条约以维护中国行政权之独立，并进一步要求修改条约，这些都是建设性的行动。芮教授也注意到同治年间江南制造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相继成立；北京有同文馆，上海有广方言馆，福建船政附设求是堂艺局。这些自强（或洋务）事业都很难得，但自强运动终究是要失败的。其基本

原因,据芮教授看,就是儒家思想与近代化是不相容的。她说:

同治中兴失败了,因为事实证明近代国家的需要与儒家[社会、政治]秩序的需要直接冲突。……愈来愈明显的是[人们]必须作一个基本的抉择:是选择儒家的遗产呢,还是选择国力日益扩张的妖魔似的新世界?[2]

芮教授的结论是,同治中兴时代的人物所要保存的是中国的传统而不是西方所谓的“国家”——因为他们常用感性语言来称道的“中国”是一种生活模式,而不一定是一个国家。他们要救亡图存,也想仿效西方,但是他们不能不问救亡的代价:

自同治中兴时代的政治家看来,他们的设施可以调整,但是在调整时他们必须有所让步,——因为不让步便不能有效,——如果把儒家社会的基本要素都让步掉,那么这不是救亡,而简直就是灭亡。[3]

笔者和芮玛丽教授是相知的朋友。70年代她已身故。笔者为《剑桥中国史:第10卷,晚清篇,1800—1911年》撰写“清代的中兴”一章,对芮教授的论点曾加以讨论。[4]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最难得的是庞百腾教授这一部专著,通过对沈葆楨生平与事业的精湛研究,整理关于同治中兴时代的概括性问题。如果芮教授的著作可称为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提出新典范的才气纵横之作,那么庞百腾之

论沈葆楨，则是借个案研究提出问题并且予以解答的专著。笔者有缘拜读庞书的初稿，这次重读其书，益感作者功力之深，立论之精到。庞先生要笔者为中译本作序，我便一口答应下来。

沈葆楨(1820—1879)在同治中兴时代的重要性，作者、译者都要讨论到。我在这里只想介绍沈氏逝世前在两江总督任内所上遗疏中的一段话。沈氏之忠于清廷在那时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的确是爱国的。如果他早期在江西任知府、道台、巡抚的政绩符合芮玛丽教授对于清代中兴的看法，那么1867—1874年间他任总理船政大臣，便已经是献身自强运动的人物了。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沈氏受命赴台抗敌；1875年奉调为两江总督，规划海防，深知西洋科技日新月异，福州船厂所造船舰尚不足以应敌。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为冲绳县，在朝的清流人物有东征之论。沈葆楨在遗疏里说：

倭人夷我属国[琉球]，虎视眈眈。凡有血气者咸思灭此朝食。臣以为兵家知己知彼之论，二者缺一不可。未有一无备豫而可冒昧尝试者也。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办铁甲船一事。……目下若节省浮费，专注铁甲船，未始不可集事。而徘徊瞻顾，执咎无人，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臣尤伏愿皇上以生安(知)之资，穷困勉之学，励精图治，为臣民先，俾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即基于蒙养圣功之日。臣虽不获身睹其盛，亦当无憾于九原。所有报明微臣病势垂危，并披沥愚诚缘由，谨口授遗折，叩谢天恩。^[5]

上引沈葆楨遺折的宗教語言，只有在儒家忠孝倫理範圍之內可以理解，但是他受日本侵略之刺激，其愛國胸懷又似非傳統所習有。沈氏雖然忠於清廷，但龐百騰教授謂沈氏的愛國觀念已含有近似近代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因素，與芮瑪麗之說不同，殊令人深思。

龐教授這部書的主要貢獻在於發現事實，並對文獻所揭示之事實作實事求是的分析。但他又進一步，凡有助於認識沈葆楨生平的概括性的詞匯，都經過反復斟酌，具體地討論，上面所說的“國族主義”只是一個例子。無論自史料的廣征博引或事實的闡述與解釋的精確來說，這部書都可以說是一部模範的專著，值得鄭重翻譯與介紹。

劉廣京謹序

1998年10月於戴維斯加州大學

注 釋：

- [1] 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second printing, 1962.
- [2] 同上書，頁 312。
- [3] 同上。
- [4]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chapter 9, “The Ch'ing Restoration,” pp. 409—490.
- [5] 引自沈瑜慶：《濤園集》，1920 年版，頁 173—174。

陈 序

本书英文原名《沈葆楨与19世纪中国现代化》，以沈葆楨为研究对象，讨论中国早期现代化问题。现代化问题自本世纪50、60年代起便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虽稍沉寂，但尘埃并未落定。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仍然吸引国内许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这固然由于在国家推进现代化事业的今天，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规划未来，人们亟欲从历史中寻求借鉴，而在更大的程度上还由于这一新陈代谢的历史本身牵涉到许多复杂的方面，仍然有待深化认识。比如，传统向现代性的演变，现代化的内部因素/条件和外部因素/条件及其彼此关系，领导阶层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现代化的认知与态度，以及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和对现代化程度的估量，等等。这些既需要史料的考求，也需要理论的阐释。而在研究方法上，从不同区域、不同人物、不同企业或不同的社会群体等入手，分别作具体的研究与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拨开时间的雾霭，揭示历史的真相，从整体上掌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及其特点。

庞百腾教授的这部专著便是这样一部著作。作者努力搜集丰富翔实的资料，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晚清重

要历史人物沈葆楨作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把研究视角局限于沈葆楨的个人经历,而是将他放在19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下作深入的探讨,并进而讨论中国早期现代化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因而其意义便不仅限于一部个人传记——固然这是一部生动凸现传主性格的人物传记佳作,知人论世,这部著作还使读者从沈葆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和所树立的业绩中,看到晚清现代化的艰辛历程和局限。全书新意迭出,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完善结合,它的研究方法及其对历史的阐释和所达到的结论,相信必能给读者以启迪。

往年尝在先君来章公书房获观沈葆楨写给他的妹夫、笔者外曾祖父吴维允(仲翔)公和他的弟弟维贞(叔章)公手札,他们当时分别担任福州船政局文案(后为船政提调)和支应处委员,两人同沈又有秦晋之好——其女各嫁沈的两子。这些信有一部分是沈奉旨去台湾办理防务时寄回福州的。信中谈到铁甲舰的购置、船只的修造、兵船的调拨、电报线的架设、经费的筹划、外籍人员的请奖和艺徒的请卹,等等。其谋事之忠、任事之勇、治事之勤,跃然纸上。本书作者在中文版序中称他“扎扎实实、实事求是地亲身监督船务”,这些信札可作最好的佐证。他不止一次慨叹“办事之难,弟所尝惯”,不但“经此变局,中外齿冷”,日本侵台,清廷交涉,“聚九州铁铸此大错,唇焦舌敝,庸可挽乎?”而且还难在人事掣肘:“瑜亮纷纷,机械林立”;更难在财用匮乏:“吏治洋务之难,且不必言,至筹饷虽三头六臂,亦无法可想”。他晚年身体已很衰弱,在一次病后,“两脚无力拜起,需人扶掖,咳甚则晕,迎风则呕”,但是却在信中一再表示“不敢以一蹶灰心”,“苦债未偿,万无死法”,因为主持船政,“此非弟

一身一家之事”，“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正是出于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利益的关怀，他呕心沥血，“谤不敢避”，在另一信中他表白自己：“吾辈出而任事，嫌怨所不能辞，只求我无愧于人，何必人都谅我，各行其是，自苦奚为？”这种不畏毁谤、不惧困难的刚毅精神，正是他的岳父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崇高思想境界的再现。然而 1875 年沈葆楨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之后，蒿目时艰，他思想上不能不又一次受到很大的触动，他在信中写道：“不才以病躯视息江南，满野哀鸿，一筹莫展，除祈死外，更无长策。”从“苦债未偿，万无死法”到“除祈死外，更无长策”，我们看到了沈葆楨忧国忧民的深情溢于言表，也看到了他思想上承受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几经挫折、几经蹉跎的负担何等沉重。本书在结论中指出，“沈是个真正的过渡人物”，关于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本书给我们作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性的说明。

本书作者庞百腾教授在 80 年代初同我即有通讯之谊，当时承他惠寄在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史论文集》发表不久的有关福州船厂利用西方技术的大作；几年前我翻译刘广京和朱昌峻教授编《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其中《李鸿章与沈葆楨：近代化的政治》一章便是他所撰写。我深感他对于沈葆楨所作长期精湛的研究，在海内外史学界尚不多见，乃向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和哲学编辑室的张晓敏先生建议出版这部当时刚问世的专著中译本，得到他的首肯，认为可以收入该社出版的《李鸿章评传》、《胡适评传》等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评传的系列著作中，并请吕健先生董理其事。百腾教授闻讯，即热情支持，积极同剑桥大学

出版社和德拉威大学文理学院联系,顺利解决了中文版版权事宜。

译者陈俱先生和我年龄相仿,少小相伴,垂髫拜同一位业师,弱冠之年又一同离闽北上,负笈沪滨。我们从小学、中学一直上大学,入同一所学校,同窗同桌,前后凡十余年,50年前始天各一方。春树暮云,世事沧桑,于今不觉都已两鬓萧疏。译者耽溺文史,老仍不疲,慨然承担此书翻译,全力以赴。书中凡中文引文,都尽可能按原作回译,甚至不远千里来上海图书馆查检。即此一端,可见他对译事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喜捧译稿,春秋佳日,攀观乌山摩崖,长夏浓荫,卧读蒙泉山馆,少年往事如昨,又复一一浮映眼前。现趁译稿付印在即,因兼述及其文字因缘,谨以为序。

陈 绛

1999年12月于沪西寓所

中文版自序

沈葆楨是我国 19 世纪历史中的一个伟大人物,是一个爱国者,又是早期洋务派的一个重要人物。郭嵩焘曾经写信给李鸿章说:“往与宝相(宝璽)论今洋务,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沈葆楨)能尽其实,其余诸公在位竟无知者。”这句话真是写得非常恰当。因为沈葆楨的的确确是一个近代化的领导者。当他担任福州马尾船政大臣时(1867—1875),他扎扎实实、实事求是地亲身监督船务,在八年中,把马尾区的一块农田和烂地,变成了清朝最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和技术训练场所。在福州马尾船厂的历史中,他是惟一的自始至终和专任的监督。他能够专心把全副精神贯注于船政的发展,这正是船厂头八年成功的一个重大因素。而且,在晚清洋务企业中担任监督的同代人中,沈的官位之高,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他洋务企业,如上海江南制造局,它的监督只不过是一个道台。这也是福州船厂的幸运和成功因素。

沈葆楨自小就受到他的身为教师的父亲和未来的岳父林则徐的经世和爱国思想影响,成为一个改革家和爱国者。改革和爱国,这两个特点我们从沈葆楨最初的政绩中已经可以看到。后来,在他担任江西巡抚、福州马尾船政大臣及台湾海防钦差大臣之后,他在这两方面的意识就更加深化。

他的改革思想已经不是片面的。例如在 1867 年和 1874 年的两次朝廷政策讨论中,他提议全面地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使之专门化和合理化。他又建议改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以求消息沟通,联系密切,使全国由上至下心手相应。在爱国思想方面,他还主张运用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蒙受的羞辱来激励掌权者,使朝野上下同心合力,亟图自强。从多方面看,沈葆楨的思想已经开始超越了尽忠朝廷的局限而趋向爱国主义。

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期,其间经过几个不同的过渡阶段。19 世纪 60—70 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而沈葆楨又是这个阶段中的重要人物。可惜在国内和国外,都还没有专著评论他的生平政绩。希望这本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能够作出一点贡献。

本书原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于 1994 年印行,是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之一。现在能够在国内面世,完全得力于复旦大学历史系陈绛教授推荐,又特别得力于陈俱先生把它翻译成中文。陈先生是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全国地方科技史志研究会和福建科技史研究会的顾问。他在解放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圣约翰当时是以英文教育而著称。再者,陈先生是沈葆楨的后人;他的母亲便是沈葆楨的玄孙女;而他的父亲又是晚清改革家陈宝琛六弟的孙儿。这次幸得陈先生辛勤劳作,将此书贡献给国内读者,这是作者的荣幸。

最后,这次中文版能够面世,承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把国内版权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并承上海古籍出版社给予鼎力支持。特此致谢!

1998 年 7 月 14 日 美国德拉威大学

作 者

庞百腾,现任美国德拉威大学教授,东亚研究部长,1992—1998年曾任该大学历史系主任。生于香港,年少时曾经肄业于广州岭南大学附属小学、香港圣保罗书院。1963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非洲与东方研究院,1969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后,即就任于德拉威大学。著作有1974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的《清代广东省档案指南》,1985年与冯兆基教授合编的《理想与现实:1860—1949年间中国近代社会与政治的变更》(美利坚大学出版社)、1972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的《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罗大春原著)及论文数十种。

说 明

多年来,我受到许多人的恩惠,我之所以懂得中国近代史,应当万分感谢 G·威廉·比斯利、丹尼斯·C·推切特、沃尔敏和刘广京,而其中最后一位不疲倦地为我的两次手稿提出建设性意见。费正清、依安·尼兹、郭廷以,还有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许多同事,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所有各位在不同时期给予的帮助,只有最好的朋友才能做到。在一所没有东亚研究所的大学里教学了一生,我很自然地托赖了不少同辈。杰克·格尔逊、玛利安·巴斯蒂-布鲁居埃和郝延平是第一批阅读我的博士论文、并给予宝贵评论的人。因为需要利用新开放的档案和其他资料,手稿连续数次修改,这又受惠于琼·里奥纳德、维勒·J·彼得逊和梯姆·赖特,他们都阅读了手稿的相当部分。他们无疑会看出本书中他们广泛评论的痕迹。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三年中,曾经把其中若干章作为论文提出,这些章节在生动活泼的讨论会上又有得益,经常参加讨论会者包括王赓武、骆惠敏、乔·摩尔、约翰·芬奇、安东尼亚·菲南以及已故的琼尼佛·顾什曼。

鉴于我的研究需要同艰深的资料打交道,我乐于再次

提到王尔敏,因为他就清朝制度和如何读清朝文献教给我许多东西。相似的是,一度在东方与非洲学院(S.O.A.S)同事的刘殿爵,曾指示我更好的翻译方法。我感激卡罗兰·菲利浦·穆斯提尔、佛兰西斯·巴则拉·卡祖乌拉和德布尔·怀特,因为他们在法国档案译成英文时,在许多困难段落上给予无价的帮助。为了对本书文笔加以改进,我应当感谢编辑玛利·拉辛。不言而喻,形式和内容上的缺陷完全归我自己。

研究沈葆楨的变动频繁的经历,需要利用散在世界各地、范围广阔的原始资料。光是找到这些材料就是繁难的工作。我有着好运气,朋友同事们不但引导我注意这些有价值的材料,而且在一些情况下无私地供给我抄本。于是,我从玛利安·巴斯蒂-布鲁居埃处得到日意格的日记抄本,从台北沈祖馨处得到未出版的沈葆楨奏折和他家的“家谱”,从福州林庆元处得到未出版的沈的信函,从康华尔·萨尔达什的F·E·伊利奥特处得到詹姆士·嘉乐尔的私人文件,从黎志刚处得到新出版的李鸿章致丁日昌的信。

我不能不提及到处遇到的乐于助人、兴致勃勃、耐心细致的档案员、博物馆长、图书馆员。我特别应当致谢的有,东方与非洲学院的约翰·乐斯特,设在文森堡的[法国]海军部档案室的保管主任M·奥道维,分别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的陈炎生和王省吾,香港大学的黎树添,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吴文津,德拉威大学图书馆的郭静姝和罗梅生。还有我得益于数不尽的人们的帮助,我有幸来到这些收藏丰富的单位拜访了他们。在已经提到的机构之外,还有:[英国]档案部,伦敦大学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馆(现称不列颠图书馆),格林尼治的国家海事博